



躬耕报业 竭尽所能

——《烟台日报》原副总编辑石学顺的故事

□丁乙

《烟台日报》即将迎来80周岁的生日。这段时间，看着报纸上关于日报的种种往事，我总会想起我们尊敬的老领导、《烟台日报》原副总编辑石学顺同志。

在漫长的报业生涯中，不论报社如何变迁，也不管自己已被安排在什么岗位上，石学顺都能心无旁骛、专心致志地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，为发展烟台的报业默默地作着自己的贡献。在报社历届领导人中，他不愧为德高望重、口碑最好者之一。他在烟台报业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。

我有幸与石学顺结缘，是1961年《劳动日报》撤销后，我被调到《烟台日报》时。当时，他是报社副总编辑，我被分配在“工业财贸室”做编辑工作。因为石学顺分管工财方面的报道，所以，我与他接触的机会便日渐多了起来。那时，大家没有称呼领导职务的习惯，我们大多喊他“老石”。石学顺为人忠厚、正直、老练，属于外冷内热的“暖水瓶”式干部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，我认定他是个值得尊敬和信赖的领导。

石学顺坚持党性原则、不忘初心、爱岗敬业，甘愿坐冷板凳。他于1958年开始任烟台日报社副总编辑，像一头老黄牛一样，不挑食、不偷懒，兢兢业业，深耕细耘，一心“爬格子”，一爬就是20多年，直至退休。他忠诚于党的新闻事业，像哨兵一样忠于职守，从来没有改行的想法。他干副职的时间长，先后陪过四五个“一把手”。不管谁是一把手，他都能不计名利，任劳任怨地甘当副手。1963年春，烟台日报社撤销后，他被调去创办《烟台工人报》，任总编辑。接到通知后，他愉快地走马上任。需知，当时他的工资级别是15级，是名副其实的县级干部。这次被调到县级市去当总编辑，属于科级职务。我们曾暗中为他鸣不平。可是，他没有半点怨言，也没有情绪低落。他带领全社同志努力工作，按照上级要求，使《烟台工人报》于当年5月1日如期出报。这足以说明，石学顺对党报的热爱，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。

石学顺的党性强，表现在他在恶劣环境中始终不忘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。有的事情

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，但它却使人记忆犹新。“文革”开始后，石学顺很快被造反派夺了权，采编人员也都停工不上班。一时间，报社内外一片混乱。陌生人络绎不绝地来到报社，好像逛集市一样，把编辑部的每个办公室都看个遍。还有的人趁混乱之机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往报社扔石头、砸玻璃。石学顺心中焦急万分。他担心夜间大楼因无人值守而遭遇不测，便来到青年记者宋世民的家中，恳切地劝说宋世民去值夜班。宋世民心中也很害怕，有心谢绝这个差事，可当他看到石总那急盼的眼神时，心一下子软了下来，胆子也大了起来，一口答应了石学顺的要求，最终很好地完成了值班任务。如今年逾80岁的宋世民，只要提起这件事，总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说当时石总在自救不暇的情况下，仍时刻关心报社的安危，想方设法保护报社的财产安全，实在难得，令人敬佩！

为了把报纸办好，石学顺不论是当副手，还是当一把手，都很重视采编队伍的建设。特别是在用人的问题上，他从不徇私情，不拉帮结派，总能做到任人唯贤，知人善任。在创建《烟台工人报》时，除了有一部分采编人员是从《烟台日报》调过来的，其余的只能在市区配备。为此，他广泛征求我们的意见，委托我们积极为报社选调人才。他要求新人不光要有写作能力，而且必须品德好。我们按照他的要求，在市区基层单位物色了一批新人。像刘淑轩、宋世民、赵修基、张洪波、房新民、刘铭恕、刘文明等，都是由我们推荐、经石总考察后调到报社来的。这些新同志有实际工作经验，干劲也足。通过传帮带、互教互学，他们很快便成为出门能采访、回屋能编写，集编辑与采访于一身的新型新闻人才，有的还成为业务骨干，才使得《烟台工人报》不仅能按时创刊，而且越办越好。

石学顺作风正派，平易近人，从来不以领导自居，不在下级面前摆架子、打官腔。在日常工作中，他遇事总愿与我们商量，耐心倾听我们的意见。他从不以不知为知，从不以不懂装懂。有一次，他审阅一篇文章后，觉得标题不够理想，于是便想去找编辑

们帮忙想一个新的标题。他手持文章，刚走出办公室，便遇到了一个年轻编辑。年轻编辑看他急匆匆的样子，便问他在忙什么，他说你来得正好，快帮我给这篇稿子另想一个好标题。年轻编辑把文章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后，略加思索便悟到了一个新的标题。石学顺听后十分高兴，当即对年轻编辑说，就用你想的这个题目！有时我们在稿件中对有的问题处理得不清楚，或者用了新的提法，他都会手持稿件，跑到编辑室来询问编辑的人，要我们把问题进一步阐述清楚，说明新提法的依据，绝不让稿件草率过关。

在报社，石学顺的廉洁自律、简朴作风，更是有口皆碑。他虽为报社的领导，却从来不搞特殊，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亲密无间，和谐共事。在三年灾害时期，有的同志因为饭量大、家里人口多，常常粮食不够吃。他知道后，会主动把自己平日省下来的粮票赠给缺粮的同志。他经常从报社食堂买饭带回家去，每次买饭时，他都自觉排队。有时站在他前面的同志过意不去，便主动让他先买饭，他总是说“不用”。他也从不要求炊事人员给他特殊照顾。那时，社会上的商品特别是食品，十分短缺，不少人都缺乏营养。看到石总因营养不良患上水肿病后，大家都很心疼他。有的记者到农村采访前，会主动去问石总，要不要给他买点海参一类的营养品，却都被他谢绝。是他不舍得花钱吗？不是！他不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比一般群众好，也担心记者把东西买回来后，不要他的钱。当时他家有四五口人，长期住在三四十平方米的屋子里。单位想为他调个稍微宽敞一点的房子，被他婉言谢绝了。他从不为子女的工作走后门。他的小儿子不到40岁便下岗待在家里，石总明知我与其儿子所在的企业熟悉，却从不在我面前提此事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宁愿自己忍受困苦，也不愿麻烦别人。

古人云：“经师易得，人师难求。”我在人生路上遇到了石学顺这样一位人师，是我的荣幸！他的高贵品德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！（于泽宜，笔名丁乙，《烟台日报》原副总编辑）



读报和写作其实是接受教育、领悟思想、积累知识、升华境界的过程。

《烟台日报》，我的良师益友

□孙瑞

我与《烟台日报》结缘已40多个春秋，她是我的良师益友，为我指点迷津，激励我奋进，引领我前行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农村精神食粮极度匮乏，几乎见不到书报。邻居是技术队的技术员，经常把全村唯一的一份《烟台日报》带回家，我便经常到他家“赠报”。通过读《烟台日报》，我了解了国内外的大事小情、实时消息，增长了见识，拓展了知识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中专毕业后参加了工作，在办公室任打字员，每天负责收发报纸，常与《烟台日报》打交道。

《烟台日报》是烟台人自己的报纸，有浓郁的胶东特色。在资讯不发达的时候，《烟台日报》作为一个地区的权威报纸，是人们获取信息、了解时事、丰富阅历、增长知识的主要途径。记得上世纪80年代，《烟台日报》有个“蜂蜜与蜂刺”的漫画栏目，在国内很有影响力，栏目名还是著名漫画家华君武亲自题写的。一天，我画了一幅漫画，壮着胆子投给了《烟台日报》。没想到，责任编辑曲凤鸣很快便来信鼓励我，要我继续努力。曲编辑还说，漫画是讽刺与幽默，它虽然不能解决实际、具体的问题，却可以发现问题、提出问题，从而引起读者深思，这就是漫画创作的目的。

后来，因工作需要，领导安排我写新闻稿件。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比较陌生，怎么写？写什么？从哪下手？我一头雾水。于是我开始每天看《烟台日报》、《烟台日报》有个老编辑叫张志卿，是莱阳人。有一年他回老家，我立即登门拜访。张编辑耐心地告诉

我，新闻的五大要素是不可或缺的，这五个要素分别是：何人、何事、何时、何地、何因。张编辑鼓励我多看报，多积累，慢慢就会掌握新闻稿的要领。

《烟台日报》是活教材，是我学习、借鉴、勇毅前行的“工具书”。看了一段时间后，我的“胆子”越来越大，冒昧地把稿子投给了曲编辑。曲编辑不但没有嫌我的文章糟糕，还不厌其烦地为我润色、纠错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1995年，我写的《小蛇也敢吐大象》的消息，获得《烟台日报》“野亦杯”短消息大赛一等奖，我还多次被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。

之后，我采写的《亿元村书记闯“三关”》《救灾英雄石凤科向河北灾区送三千斤鲈鱼》《引进人才二百，新增产值两亿》《农民出巨资，培养翻译官》《放下经理大架子，拿起养猪瓢把子》等通讯，先后在《烟台日报》上发表，在社会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。我也连续十年被莱阳市委宣传评为“十佳通讯员”，被《烟台日报》评为优秀通讯员。我觉得，读报和写作其实就是接受教育、领悟思想、积累知识、升华境界的过程，而陪伴我一路成长进步的，就是《烟台日报》这位启蒙老师。感谢甘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日报编辑，他们润物无声，一路陪伴着我，给我养分，让我快速成长。40多年来，我先后在《烟台日报》《烟台晚报》发表新闻、文学作品800多篇。其中，2024年我在两报上发表文学作品30多篇。

春华秋实，硕果累累。

《烟台日报》是烟台跨越发展、加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见证者：是有温度、有浓度、有广度、有深度、有厚度的党报党刊。2021年

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是“十四五”规划开局之年，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起步之年。这一年，《烟台日报》重磅推出了“我和我的烟台”系列报道，形象地反映了时代进步的声音，传递出人民对社会的呼唤和需求。很多笔墨，可以说是永恒的、不朽的。

作为精神的领地、思想的家园，《烟台日报》总是将思想性、文化性、趣味性、知识性相融合的文章，组合成雅俗共赏的版块，成为读者精神上的追求和寄托。特别是理论版，有责任、有担当、有新思想、新见解，成为我们心中的灯塔，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

80年，对于人类历史长河来说，不过是短暂的一瞬，而对于《烟台日报》来说，这可是光荣、荣耀、辉煌的80载风雨历程。从过去的4版小报到后来的12版大报，从黑白到彩色，从单一的纸媒到如今的融媒体，一张张报纸串联起许多难忘而动人的故事，见证时代发展，反映社会变迁。

如今，我依然喜欢《烟台日报》，因为她是一本内容丰富的“百科全书”，可以让我学到许多有用的知识；因为她是成长的乐园，是众多文学爱好者的精神家园。读《烟台日报》，可以纵览国内外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，可以掌握稍纵即逝的市场信息，也可以获知大千世界的精彩。

《烟台日报》将伴随我终生，永远是我的精神食粮和良师益友。

祝《烟台日报》越办越好！

（孙瑞，中共党员，大学文化，曾是《烟台日报》通讯员，现退休在青岛居住。）

日报教我如何做人

□张志卿

值此《烟台日报》创刊80周年之际，我的心头涌上了无比激动和荣幸的浪涛，因为，我曾在此工作了30多年。作为报社的一分子，怎能不激动万分！

在这20多年里，有多少个令我难以忘怀的点点滴滴。可是，令我受益最大、最让我难以忘怀并感恩的，是她教会了我如何做人。自来到烟台日报社那天起，一直到退休，到我85岁的今天，我一直遵循着她的教诲去做人做事，由此养成的优良习惯，让我在耄耋之年回顾往事时，能够无愧无悔，心安理得。

我是1984年5月10日来烟台日报社报到的。当时《烟台日报》由“小报改大报”，扩招了一部分人员，我便是那时从莱阳宣传部调到报社的。

到报社安顿好后，我们这些“新人”的第一堂课便是“职业道德”课。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社会上很少见到记者，人们对记者这个职业感到很神秘，所以记者无论到哪里，都会被当作贵宾，“无冕之王”的称谓对当时的记者是非常贴切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有记者忘乎所以，严重损坏了新闻记者、新闻单位的声誉和形象，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报社领导特别重视对“新人”的职业道德教育，把它放在业务学习之前。

我至今仍记忆深刻的是，领导苦口婆心地对我们说：“社会上的人们之所以尊重记者，把你们当成贵宾，不是因为你们个人多么能多么棒，多么有本事有水平，而是因为你们头顶着‘烟台日报’四个字，是因为你披着‘新闻记者’那面‘大旗’，没有了这个头衔，你试试。”报社领导深情告诫我们：“务必低调做人，高调做事。”这番话，强烈触及了我的心灵。我将它奉为信条，牢记在心，切实落实到了我的工作和生活中。

那是1986年，我们记者部新来了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小代，我带着他一起到乳山县采访（当时威海还没有单独设市，乳山县还属于烟台）。我们到了乳山汽车站下了车，小代就要我给乳山宣传部打电话，让他们派车来接。因为我到乳山采访过，知道宣传部离车站很近，步行也不过十分钟，就说：“宣传部离这儿很近，我们走过去就行了。”小代说：“那不行，那样我们不是掉价了？”我几乎是用训斥的口气怏他：“走过去就掉价了？我们有什么价？不要到了报社就学着摆谱！”他红着脸跟着我步行去了乳山宣传部。

副刊引领读写课

□牛图

读书时，受同学张矫、矫健的影响，我也爱上了文学创作，却苦于阅读太少，功底浅薄，便开始扩展视野，大量阅读中外名著。踏上语文教学岗位后，领导见我科班出身，便安排我教高三。彼时，语文高考试题相对简单，分数拉不开。语文要想得分，须在阅读、写作上下功夫。

紧张的教学让我没时间阅读大部头文学作品，脑子里整天想着如何提高学生的读写水平。为了促进语文教学，我爱上了读报纸副刊。不管国家级还是省市级，每期副刊均有千字文，读到感动人心的，我便及时读给学生听，偶尔也会把刊物中的散文、小说推荐给学生。那时我读得最多的是《烟台日报》副刊。读后，我也会写一些散文随笔，寄给《烟台日报》。偶尔发表，复印下来，阅读课发给学生。我曾在《烟台日报》“半岛”副刊发过《父亲的手》（编辑熊辰龙）、《母亲的手》等文章。作文课上，我也让学生写父亲、母亲的手，批改后，感觉没有上乘文章，便把我的文章拿出来，让学生参考。学生读了以后，我再让他们写第二遍。作文收上来后，我选出几篇好的，再复印给学生。

开始的两届高三毕业班，高考语文成绩虽然还可以，但远远没达到我心中的目标。我反复思考后悟悟到，我忽略了重要的环节——阅读。学生的脑子里没有“米”，作文翻过来覆过去也就那么一些事、眼前事，记叙几乎是流水账式的生活再现，虽然真实，却没有美感；议论观点加几个常见事例的堆砌，没有深度更没有新意。于是我改变了教学思路，增加了自习课和阅读课。我会把每期的《烟台日报》“半岛”副刊上的文章复印下来，让学生阅读；报纸上有好的新闻、典型人物的事迹，我也会介绍给学生，作为议论文的论据。我还发动学生回家搜集报纸，尤其是《烟台日报》副刊，集中起来让学生们在阅读课上学习。我还让学生们背诵好文章。比如，我把自己在《烟台日报》副刊发过的《苹果的预言》（2005年2月25日）、《乡间胡同》

后来，这位小代回到老家某县的一个乡镇中学当了教师。

还有一次，我到某县一个镇采访，从我的宾馆到这个镇有好几十里远，当地的宣传部专门派车送我们。上世纪80年代，轿车还比较少，有人对乘坐轿车的人有一种莫名的反感。当我们的车走到一个村头时，正好遇见五六个人在伐树，一棵不算很大的树横躺在路上。我们的车到了树前，那几个伐树的人还坐在那里，几乎是笑咪咪地看着我们。司机想叫他们把树搬开，我连忙阻止：“千万不要坐在车上吆喝人家。他们想搬早就搬了，你坐在车上吆喝他们，他们才不会给你搬呢，还是咱们自己下去搬吧。”我和宣传部的通讯员以及司机，下车把树搬开，继续赶路。这时我发现，那几个人看向我们的眼神变了。

有一次，我去采访一位带领穷乡僻壤的村民脱贫致富的村党支部书记。那天，乡里没有车接送我们，宣传部也没车，我便说：“能不能找到自行车？我们骑车去。”于是，我和通讯员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赶往那个村。采访完，我们也没有麻烦人家，骑车回到县城吃了便餐。

还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。那是我到家乡采访，顺便去老家看望70多岁的父母。回家后，看到他们还在吃玉米饼子，就想给他们买点小麦。到哪里买呢？我一下子想起了我采访过的一个村党支部书记，他们村是泊地，小麦多。找到他一说，他满口答应，给我磨500斤面粉，并派车送到我家。后来我去找他算账，可他一拖再拖，总说不忙，以后再说。可我总觉得是块心事。其他人对我说，你真死心眼，人家那是给你的，不用你算账了。我说那可不行。我执意要结账，以至于那书记都不耐烦了。后来，我在村委办公室，当着众人面，高声对书记说：“这会儿，咱们把小麦钱结了吧。”他这才无可奈何地叫来会计给我算了账。结完账，我如释重负，一直轻松到现在。

如今，我已退休25年，已经是耄耋老人了。我从心里感谢当年《烟台日报》的领导在我刚到报社时给我上的“道德教育课”，让我无牵无挂地安度晚年。

近几年，从企业到机关事业单位，都把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放在了第一位，强调“做事先做人”。我心里想，《烟台日报》早在40多年前就这样做了，我深感荣幸，不胜感慨。

（2005年10月21日）、《老屋》（2005年12月26日）、《四代人的嫁妆录》（2009年9月4日）等十几篇散文拿给学生，让他们反复读，先复述，后背诵。有的同行对此不理解，说：“你这不是搞个人崇拜吗？学生有课本上的经典文章要背，背你的文章干嘛？”我只能说，课本是为学生积累基础知识用的，是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重要载体，但并不适合仿写作文。而我的一些千字文，从篇幅和立意上都跟学生贴近，他们望之可以达之，甚至超之。我还把自己高考时写作的随笔和散文讲给学生听。1977年恢复高考前，我手头没有资料，全靠平日阅读自己订阅的《解放军文艺》和矿里订阅的《人民日报》《大众日报》《烟台日报》来积累写作素材。那时我在矿上做宣传员，每期报纸，我都从头到尾地看，重点阅读副刊和《解放军文艺》，有的文章几乎能背诵下来。读后，我会兴趣浓厚地写些随笔和散文。记得里面有几篇纪念领袖去世的散文，读后让我流泪，便仿写了我和师傅们为领袖去世而悲怆的文章。1977年高考，我见到作文题目《难忘的一天》，心中大喜，当即重写起自己的那篇文章，顺利地完成了作文。

我把这一经验用到了自己的教学里，告诉学生备下足够的粮米，也许临场能够仿写自己的文章。即便没有可以仿写的，也可能积累到适合的题材。这不叫抄袭，这叫不打无把握之仗。

其实，从小学到高中，学生们写了十几年作文，可到了考场，面对题目时仍有不少人依然彷徨。在短时的不足一个小时的时间里，要想写出一篇高分作文，即便才高八斗，也可能会捉襟见肘。而我的学生，在我的指引下读《烟台日报》和其他一些报纸副刊，材料仓库储备充足，每届高考时，语文成绩总高出平行班几分，这也算是一种成功吧。

（牛图，本名牟民，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栖霞一中语文高级教师。散文《在刀子和玫瑰间行走》获2023年齐鲁青未了散文大奖赛第一名。）